

论汪景祺及其《西征随笔》

吕园园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清人汪景祺, 学识渊博, 素有志于世, 晚年投奔年羹尧, 随其西征, 据途中见闻, 撰成《读书堂西征随笔》一书。作为清代笔记的代表作之一, 此书如实记载了清前期西北战事、吏治、官员品格为人等相关事宜, 为后世研究清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此书为汪氏亲历之作, 在展现其文学造诣外, 更多的是他仁政的治世思想以及“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此点历来为学者所忽视。

【关键词】汪景祺; 西征随笔; 民本思想

【中图分类号】H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2-0053-05

《读书堂西征随笔》(下简称《西征随笔》), 系清人汪景祺随年羹尧西征期间所写, 本书详细介绍西征相关细节, 大胆议论时政, 并涉及不少官员品格为人相关事宜, 其文献价值在清人笔记中实属凤毛麟角。汪景祺身陷文字狱, 不仅使此书受遭禁之遇, 也使得清代议论时政的笔记大为减少和逊色, 为清朝初期笔记体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在清朝学术界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汪景祺其人

汪景祺(1671—1726), 原名日祺, 字无己, 号星堂, 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汪出生于宦官之家, 其父“(汪)霖, 字东川, 浙江钱塘人, 以丙辰进士授行人, 举博学鸿词, 改检讨, 仕至户部右侍郎”^{[1]P256-257}; 兄长汪见祺任当时礼祠祭主事^{[2]P323}; 族弟汪受祺为翰林编修^{[2]P323}, 汪景祺本人亦“少承家教, 博览群书, 成为一代饱学之士”^{[3]P43}。家族父兄都是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影响、自身深厚的文化功底, 促使他孜孜于仕进之路。

据相关资料记载, 汪景祺“年轻时即与一些诗人耆老, 如朱彝尊、毛奇龄等相与交往”^{[4]P740}。除推荐过他的胡期恒^{[5]P10365}, 与他相熟的还有尤侗^{[6]P5782-5783}、顾侠君^{[7]序}、庄书田^{[8]P6283}、吴尺凫^{[8]P4237}等, 汪景祺的这些朋友都是当时较有名气的文人, 可谓个个学识渊博, 脾性倔强而直率, 这也难怪他在自序中亦自称“忆少年豪迈不羁, 谓悠悠斯世, 无一可与友者……其意以为, 君辈未尝读破万卷书, 安敢向我鼓弄唇舌耶?”从中不难看出少时汪景祺的狂傲与不羁。汪曾著有《读书堂诗集》上下卷, “前有朱彝尊、毛奇龄、章藻功张大受四序; 又有又有吴廷桢和王誉昌为之题词”^{[9]P111}。但由于汪景祺晚年身陷文字狱, 影响颇巨, 序都被铲去, 无一篇留下。就连当时“与

(景祺)唱酬极密之查德尹(嗣璫, 嗣庭之弟)《查浦诗钞》中绝无一字及无己……”^{[9]P113}。所幸, 黄裳先生搜得汪诗三首, 以见其才情^{[10]P161}:

《舟次虞山过牧斋先生故居》四绝(取其三)

影堂深树两萧萧, 苔闭重门久寂寥。

管领眼前新俎豆, 不堪回首望南朝。

廷野争传谢传名, 出山可是为苍生?

疏桐叶落空阶月, 疑是上书旧履声。

燕许文章屈宋才, 岂无麦秀黍离哀。

余生且缓须臾死, 为录成仁事实来。

仅此三首已足以领略其文采, 黄裳先生曾评价曰:“无己诗颇不恶, 有奇气。置于清初诗人中, 亦当是一作手”^{[9]P115}。除展现文采, 诗词更明确道出汪景祺之所以对仕途孜孜以求, 除受其家族父兄之影响, 更是由于其心怀苍生之志。可这位“为录成仁事实来”的才子能人, 却一生仕途坎坷。“约于1700年(康熙39年), 汪景祺为国子监生员, 1714年(康熙53年)中举”^{[4]P740}。此时汪景祺已跻身上层绅士阶层, 在接下来的会试中, 如果“及第即为‘进士’……凭藉这一功名, 他们可以直接进入官场”^{[11]P26}。这对于素有治世之愿的汪来说无疑是最佳选择, 但此后屡经应试, 均未遂愿。纵有满腹才华却无用武之地, 年已过半, 这不得不使恃才傲物的汪景祺心中憋着一股闷气, 在其著作《西征随笔》之《步光小传》一文记述了自己与一名歌妓的一夕之谈, 通过该歌妓的“琵琶半面”及阐述其悲惨人生, 触发了自身内心仕途不顺的失意与怅惘之情, 自比“江州司马”, 怀才不遇之情寓于其中。回望一生, 不由得产生“渐知素昔之非, 降心从人, 折节下士”, 但他的脾性

收稿日期: 2014-06-25

作者简介: 吕园园(1989-), 女, 江苏宿迁人, 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历史地理学。

仍旧不改,遇事仍旧“侃侃不少,假借如故也”。《清代名人传略》分析其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他屡试不中,而家中其他人却已先后成为令人羡慕的进士……致使他颇有自卑之感。”^{[11]P741}。可从其所作诗词及其品性来看,父兄的步步青云与其自身苦苦追求却不得的鲜明对比或许会使他产生自卑感,但自己的治世抱负尚未实现的现状更能让其受挫。

正是这份强烈的政治抱负,使得汪在科场上屡试不第后,只得采取另一策略,做幕僚。“总督、巡抚和其他官吏幕下的幕友也可被保举出任官职……封疆大吏的幕友常常是上层绅士。”^{[11]P31-32}。因此,雍正二年(1724)初,汪景祺千里奔波来到西安投奔故友,时任陕西布政使的胡期恒,“此时的胡期恒被任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的年羹尧结为心腹死党,关系密切”^[12]。经胡引荐,汪投书年羹尧,极尽谄媚吹捧之能,大得年欢心,很快就做了幕宾,此时汪景祺已五十三岁。尽管其过程有些卑下猥琐,让人不敢恭维,但想其蹉跎多年,终有一丝机会施展抱负,对其这偶尔所为理应同情。岂料,还尚未等其一展身手便成了雍正朝初期高层政治角逐的牺牲品,其作《西征随笔》成为年案的借口之一。后雍正帝又以“(《西征随笔》)内诗句有‘皇帝挥毫不值钱’讥讪圣祖,又讥讲圣祖谥法,雍正年号,作功臣不可为论,以檀道济、萧懿比年羹尧,以鄙亵无稽之语污张鹏翮,律以大逆不道立决枭示。”^{[13]P256}。汪景祺被令砍头,头颅被挂在菜市口的高杆上长达十几年,其妻子被发遣到黑龙江给穿披甲人为奴,期服之亲兄弟、亲侄均被革职,发戍宁古塔,连五服内的族亲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亦一律革职,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成为雍正即位以来发起的第一场文字狱的受害者。

历史的合力促成了汪景祺这场文字狱,可以说,汪景祺本人是雍正朝初期政治斗争的见证人,而其书《西征随笔》则是康雍时期政局的真实记录。

二、《西征随笔》成书过程及其流传情况

《西征随笔》是汪景祺随时随地的亲历之作。系由直隶经山西到陕西的途中以及在秦中(属今甘肃)期间所作,其自序中亦云:“自邢州取道晋阳河东,入潼关,至雍州,凡路之所经,身之所遇,心之所记,口之所谈,咸笔之于书,其有不可存者,悉毁弃之,名之曰《读书堂西征随笔》”,道出了成书过程。

“《西征随笔》是汪景祺于雍正三年五月在年羹尧作幕僚时完成,但他年初才见到年羹尧,显然书中许多内容写于见年之前”^[12]。除时间角度,亦可从

本书内容上推测出。据现存版本,《西征随笔》内容的主要分界线为《上抚远大将军书》一文,此文成于雍正二年(1724)四月十五日,前半部分为见年之前,主要为汪景祺途经直隶经山西到陕西的路途中的所见所闻,时间大致分布在雍正二年二月至四月之间,此时汪景祺与年羹尧尚未见面;约于四月份,经胡期恒引荐,汪景祺投书《上抚远大将军书》于年羹尧,得其欢心,并做了幕僚;书的后半部分主要成于见年之后,主要为汪景祺亲历西征战场和揭露官吏之恶行等方面的内容。从此书前后内容侧重点的鲜明对比可以看出,《西征随笔》是汪景祺亲身经历的实体笔记,同时也是汪景祺尽幕僚之职责的具体表现,更是汪政治能力的展板,空有一身才华却不能得到统治者的认可,汪把他沿途中所发现的吏治腐败问题及相关政治弊端的解决方案都写入《西征随笔》,不惜放下傲骨,谄媚年氏,只希望能在抓住年羹尧这最后一根“仕途救命稻草”的机会下,可以通过年传达给最高统治者,以实现其追求一生却又尚未实现的治世抱负。

年案发生后,年府被检,汪献给年羹尧的《西征随笔》被杭州将军鄂弥达、浙江巡抚傅敏等从年羹尧书房乱纸中搜得,雍正帝在其首叶御批“悖谬狂乱,至于此极,见此之晚,弗使此种得漏网也”。随即被命“藏在大内懋勤殿的大箱子里原意是叫它永远不得流传于世”^{[14]P162}。直至民国时此书才被从故宫博物馆中翻出,可惜版本并不齐全,仅存上卷一册,下卷仅存《功臣不可为》和秦中奏凯歌十三首,“故宫博物馆出版的《掌故丛编》于第1至第6辑予以披露,1928年出单行本”^{[15]P312-313}。故宫博物馆于1936年据原稿铅印,编者还把浙江巡抚李卫关于此案的奏折内容附于自序之后。至1984年,上海书店的版本把上下两卷编辑在一起。

可以说,《西征随笔》尽管内容表现出有些夸张和某些程度的不真实,也不乏有汪氏对仕途不顺的愤懑,但和它的作者一样,都经过了坎坷际遇的磨砺,总体来说看还是瑕不掩瑜的,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

三、《西征随笔》的主要成就

作为清代较为大胆地议论时政的笔记,《西征随笔》为汪景祺眼闻耳闻的亲历之作,内容涉猎广泛,如实记载了清前期有关西北战事、吏治、官吏品格等为许多极为敏感的政治和社会相关事宜。为后世研究清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此书为汪氏亲历之作,在展现汪氏文

学才能的造诣外,更多的是他仁政的治世思想以及“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

(一)亲历西征,补缺史料

雍正元年(1723),青海罗卜藏丹金会盟叛乱,“声势震动了川、陕及甘、凉、肃州地区”^{[16]P295}。十月,年羹尧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在岳钟琪的紧密配合下,调兵两万分兵三路对叛乱者发起进攻,迅速平定了叛乱。“(1724年)二月,……蒙古各台吉纷纷投向。罗卜藏丹津……逃往准格尔,其母、弟、妹都被清军俘获”^{[17]P230}。西北、西南局势得到稳定。年羹尧又提出著名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得雍正帝赞许,在青海的准噶尔势力被彻底驱逐。“这是清朝统一边疆事业中的一个重要成就,而此举是在雍正的决策、领导下,在年羹尧具体指挥下完成的。”^{[18]P99}

汪景祺跟随年出征,作为西征的亲历者,详尽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西兵之捷》一文记述了年大将军一行使敌强我弱的局势发生逆转,凭借其英勇谋略,顺利平定罗卜藏丹金叛乱。在罗卜藏丹金来犯时,“其势甚横”,情况十分危急,“年大将军不及调兵,单骑至西宁”;至前线,却发现“西宁兵止一千五百人,皆老弱不胜兵器,且亦无甲冑。”且援兵不得即至。“罗卜藏丹金闻年大将军来,颇惧,后觐知无兵,复入寇,城外诸堡咸为所破,焚掠一空。”面对叛军连连进攻,“年大将军屹然坐如故,罗卜藏丹金惊以为神。”在分析敌强我弱的形势后,年采取正确方针,“下令夜斫贼营”,取得成功,鼓舞了士气,在最后取得大捷后,又果断下令曰“穷寇勿追”,足以见得年大将军的谋略,并称赞曰“向使年大将军至西宁迟数日,则西宁必破。……西宁破,则河湟无完土,长驱至西安矣”。年大将军“帷幄运筹、决机制胜”,终破西夷边患。

年向雍正汇报西征大捷的奏折如下:“臣遣岳钟琪率大军往剿青海,擒获罗卜藏丹金之母……及其妹夫……等,并男女牛羊无数……随分兵至乌白克,擒获吹拉克诺木齐,札锡敦多卜并男女驼马,及助乱之八台吉亦俱擒获,罗卜藏丹金带二百余人逃窜潜匿,青海平”^{[19]P388}。作为现场目击者,汪景祺细致具体地记述了这场战争中百姓所受的灾难,尤其是战后女子的悲剧命运。而这些为其他史籍所忽略。在《记台吉女自缢事》一文中,年大将军虽破西夷边患,但期间亦杀害很多无辜。“西夷大创,临阵斩获者无算。有掳其全部者,除贼首三人解京正罪,余五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皆斩之,所杀数十万人。不但幕南无王庭,并无人迹”;女子面临着更加悲惨、冤屈的命运,她们“皆以赏军士,各省协剿官

兵归伍者,咸拥夷女而去。西安府驻防八旗兵回镇将士,除自获者,年大将军复赏以夷女五百人。”其中某一台吉之女(明末清初,厄鲁特蒙古所属的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杰驻牧青海的八个儿子的后裔,称为和硕特八台吉)被配与某一士兵,其主母让她跪叩,台吉女愤甚,大言曰:“我在塞外时,汝辈安得见我。即日于帐外叩首,我亦不屑也。”终不堪忍受侮辱,痛哭不绝声,最后自尽。汪感慨曰:“年大将军虽立奇功,衔冤地下者,岂独此女一人而已?”

汪景祺亲历西北战争,将激烈的战争经过及战俘所遭受的悲惨命运交代甚详,非亲历者难以述及,为诸如《清史稿》、《清史列传》《清代通史》等相关史籍填补缺略,也给后人研究西征及民族关系提供了相当珍贵和细节性的原始资料。同时,汪为年氏幕僚,在年羹尧取得如此辉煌业绩时,他并未一味歌功颂德,而是选择真实地揭示了此次战争的残酷。能够对处于顶峰的幕主发出“年大将军虽立奇功,衔冤地下者,岂独此女一人而已?”如此批评式的感慨,足以折射出汪景不卑不亢的人格。同时,汪发出对年将军残酷处理战俘方式的不满,亦体现出汪景祺的仁政的治世思想。

(二)揭露吏治,大胆议政

《西征随笔》版本不全,现存仅三十四篇,但其中关于政治方面的就多达二十三篇之多,此书涉及和议论时政之大胆及广泛,在清初笔记中实属凤毛麟角。同时汪景祺针对沿途发现的问题所提出的政治建议亦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高超的政治远见。

1.吏治腐败现象。本书中有大量篇幅涉及到当时吏治腐败的相关现象,对当时一些官吏苛政、贪污、鱼肉百姓的情景无不直笔,直揭官场黑暗。《程如丝贪横》揭露程如丝通过重贿调补夔州知府,因贪财而“凡商家所有之盐尽以半价强买之。”《榆林同知汪元仕》云汪元仕“穷奢极欲……遂致亏空数万金”,一副欺强凌弱、恬不知耻的贪官嘴脸。诸如此类。

其中,《西安吏治》一文对当时陕西吏治败坏的现象叙述得极为露骨,且把矛头直接指向满洲人。“吏治之坏莫甚于陕西,数十年来,督抚藩臬皆以满洲人为之,目不识书,凡案牒批答,第责之幕客,……吏治民生,皆不过而问焉,惟以刻剥聚敛,为恒舞酣歌之计而已”。最终,官逼民反,围城之事屡见,“有司皆重足而立,莫保旦夕之命”。如“万泉令瞿某……私派扰民,聚数千人围城,斩关而入,焚其公堂”。对于百姓聚众围城叛乱,汪景祺自发

见解：“民虽凶顽，然至聚众为变，皆有司之自取。若减刑薄敛，休戚相关，民安得变？即有不逞之徒，号召聚众，众亦不为聚也”。

《遇红石村三女记》与《记蒲州常生语》两篇，则反映了素称富饶的山西平阳郡，因为官吏贪污搜刮，民不聊生，最终激起了当地人反抗，出现“胭脂贼”（一群女子组成）。《遇红石村三女记》一文记述汪氏与胭脂贼的偶遇；《记蒲州常生语》一文则对胭脂贼有详细说明，汪景祺通过与蒲州之博士弟子常生交谈得知，“平阳……所谓河中用武之地。顾其俗勤而俭，民朴以淳”，不料，“三十年来，有司腴民以奉上，官取之间左者十倍。正供桁杨桎梏，至卖儿贴妇以偿，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见雨雪者数年矣，岁歉无收，赤地千里……此天时之灾也。”官夺歉收，百姓无以糊口。由于人性剽悍喜斗，女子皆知兵事，以至“其有气节者，自负武勇，皆为男子装出放马劫掠土人，谓之胭脂贼”。

随着国家的逐渐统一，清廷采取了一系列了安抚政策，恢复生产，缓和民族矛盾。如：“从康熙二十二年至四十九年（1683—1710），先后八次巡视山西……山西地方上也涌现出一批关心民生的清官”^{[20]P259}，同时还承办诸如赡养、救济赈灾等事务，“雍正初，山西丰收，百姓乐业，社会安定”^{[20]P259}。山西多旱、屡有天灾、有些官吏不称职，雍正帝对之并非没有关注，在与侍读大学士等谈话时，曾说：“田文镜致祭华岳回京，朕询彼经过地方情形与百姓生理。据奏：‘山西平定州寿阳县、徐沟县、祁县等处，雨泽歉少，民计维艰。汾州府属雨未沾足，地方官现在征比钱粮。’夫巡抚以扶绥地方为职，今平定等处饥谨，并未奏请赈济缓征，乃反行催科，小民何以存济？此皆伊等去年曾奏得雨，今欲掩（饰）前言，甚属不合。即命田文镜会同巡抚音德速行赈济，务使得所”^{[19]P378}。可以看出，由于臣下欺瞒，雍正对此事是不知情的，在得知后，立即派人去办理了此事。汪是在雍正二年，去投靠友人的时候写的书，而此次君臣谈话则在元年四月份，明显在汪之前。此处记叙不免略显夸张。

但是总体来说，汪景祺详实记载了康末雍初时期官吏贪污，民众疾苦，最终官逼民反的现象，在丰富相关史料，还原历史的同时，汪氏对百姓聚众闹事的行为不予否定，而把此类现象归因于当地官员，认为其咎由自取；而对“胭脂贼”现象则曰，“缓之则事不可知，急之则其变立至”。如此大胆地议论时政与直白地告诫统治者，一方面展现出汪不畏权贵、直击朝政敏感区域的气节，另一方面也流露

出汪景祺的民本思想。

2. 官吏品格为人。汪景祺在书中大量揭发了康熙后期、雍正初期官吏，尤其是名臣、能员的阴私秽行，揭露官场的污浊与官员的庸劣。《宿迁徐用锡》一文云进士徐用锡外直内诈、奸险小人。《高文恪遗事》一文则记载高文恪受过索额图的恩情，后又联合大学士明珠压倒索额图的忘恩负义的行为。《熊文端明史》说熊相国赐履于江宁（今南京）监修《明史》，没有卓见却收受贿赂。

《遂宁人品》一文极力贬低当时名臣张鹏翮^{[21]P10128}，“张素轻邪，甚至与人家奴博，且胡粉饰貌，搔头弄姿，后以天语有戏旦之言，大惭，逐矫强修饰，自称道学先生矣。”对张为官期间所做的事情，及其不雅的私人生活，汪景祺“尝谓宜以刻薄寡恩、顽钝无耻二句为对联，赠遂宁，有云犹未足以尽其为人”。对于张鹏翮，其他相关记载大都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清史稿》记叙了康熙帝对他的肯定与赞赏：三十九年，官员弹劾张侵蚀挪用救灾银，上曰：“鹏翮往陕西，朕留心访察，一介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21]P10129}；关于张鹏翮的治河方面，康熙曾曰“鹏翮自到河工，日乘马巡视堤岸，不憚劳苦。居官如鹏翮，更有何议？”^{[21]P10129-10130}等等，张鹏翮在康熙时期可谓是一位受皇帝器重的大臣。对于张鹏翮的众多诽谤、弹劾，康熙帝对张氏的谈话可谓一语中的，“大儒持身如光风霁月，况大臣为国，若徒自表廉洁，于事何益？”^{[21]P10131}。在张死后，雍正帝后人也为其写了一副对联“志行最修洁，入仕至为相，历时五十余年；天下数廉吏，流芳于竹帛，当推张公第一。”^{[22]P64}足见张鹏翮的廉洁公正、一身正气。

可汪景祺却一反常调，对其全面污蔑，对此王进驹评价曰：“汪景祺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盛世’中的清官、名臣、能员的卑劣、恶浊的一面，有着对现实的不满与批判，但又带有浓厚个人偏见的人身攻击色彩，相当真切地呈现出一个仕途失意的文人对官僚阶梯高处的幸运者的妒恨心理”^{[23]P53-54}。不可否认，汪景祺在揭露官吏腐败、人品恶俗等方面不免流露出对统治者没有发现自己、任用自己的愤懑与不甘，且难以反映人物的全貌。但是，此耳闻目睹的记叙提供了人物的原始资料，对于传记研究，亦非常宝贵，便于研究者利用以全面分析人物。

四、结语

《西征随笔》汪景祺耳闻目睹的亲历之作，亦是清初较为罕见的以时人时事为主要内容的见闻录。汪景祺在完成此书的第二年，即卷入年案而身

首异处,著作遭禁,雍正还不忘宣称“若將此文并发,恐众人谓朕恶其咒诅,故加诛戮,是以未将此文发出”。^[24]但此杀鸡儆猴之策一出,人人自危,文人不敢再议时政,此类书籍也大为减少。作为当时较为大胆议论时政的清人笔记,《西征随笔》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

的文献价值。书中虽夹杂了一些个人的义愤情感,但是,能够如此深刻而广泛的议论时政,足见其政治才能与思想深度。全书流露出汪景祺为国为民的政治抱负以及其步入仕途的渴望,展现了汪景祺仁政的治世思想以及“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值得后人借鉴。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萧爽.永宪录(卷三)[M].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
- [2]张书才.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六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1989.
- [3]郭静洲.汪景祺与《读书堂西征随笔》[J].文史杂谈,1992(5).
- [4][美]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 [5]赵尔巽.清史稿(卷295)[M].上海:中华书局,1977.
- [6]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七十一)[M].上海:中华书局,1981.
- [7]顾嗣立.元诗选[M].上海:中华书局,1987.
- [8][清]徐珂.清稗类钞[M].上海:中华书局,1984.
- [9]黄裳.笔祸史谈从[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 [10]周宗奇.文字狱纪实[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 [11]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 [12]简宪岸.清雍正初汪景祺《西征随笔》“逆书”案[J].观察与思考,2000(10).
- [13]魏源.圣武记(卷三)[M].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
- [14]周宗奇.文字狱纪实[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3.
- [15]冯尔康.清史史科学[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4.
- [16]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中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 [17]边力扎布.蒙古史纲要[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 [18]田露汶.略论雍正帝与年羹尧关系的演变[J].历史档案,1997(04).
- [19]蒋良骥.东华录[M].山东:齐鲁书社,2005.
- [20]降大任.山西史纲[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 [21]赵尔巽.清史稿(卷279)[M].上海:中华书局,1976.
- [22]杨子才.清正廉明 一介不取——清代廉吏张鹏翮[J].中国监察,2006(14).
- [23]王进驹.一份清代失意文人病态心理的标本——谈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J].广西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1).
- [24]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四十八.雍正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谕[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On Wang Jingqi's *Xizhengsuibi*

LV Yuan-yu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Wang Jingqi, living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as knowledgeable and ambitious. In his late life, he went to Nian Gengyao for shelter and followed him to suppress a rebellion in the west of China. He composed his essay according to what he saw and heard on the way.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Qing Dynasty Notes*, this book documents the early Qing officials, northwest frontier war, politics of northwest minority and other relevant facts. Although the book embodies his high literary attainments, Wang's benevolent kingcraft thought and his "people-oriented" thought are more valuable, which is often ignored by researchers. This book is based on his own experience, so it provides a valuable first-hand materials for the later research o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Wang Jingqi; *Xizhengsuibi*; people-oriented thought

(责任编辑:周锦鹤)